

與法國大革命生死相聯

——悼福亥

• 張 倫

7月14日，法國國慶，一個傳奇、輝煌、神秘而又令人長久思考的日子。在一如既往每年的香舍麗謝大道閱兵和總統例行的國慶談話外，去年，一個出人意料的重要新聞佔據了媒體：福亥 (François Furet)，這位以研究法國大革命而聞名於世的歷史學家，在因事故受傷昏迷數天之後終於不治而逝^①。

消息震動了法國的學界和政界，法國新任社會黨總理約瑟潘說：「一個偉大的歷史學家離我們而去。」學界則痛惜繼中世紀史研究泰斗杜畢 (Georges Duby) 過世之後僅僅數月，史學界又一巨星的隕落。此前四個月，福亥因為當選法蘭西科學院 (Académie Française) 院士而一時成為法國這個以學術文化為無上榮光的國度裏的新聞；現在，在萬籟紀念法國大革命的燄火和禮炮的聲響中，他也終於放棄了畢生從事的這段歷史的探尋而自己走進歷史，在那徐徐降落於夜幕中的點點星火相伴下，去跟那些只在陳舊的歷史文獻中、在暗夜艱難思考和歷史想像中會見過的人們相會：丹東、馬奈、羅別斯丕爾、拿破崙……自然，也許

他最急於見到的，還是他心儀已久、晚年着力最多的托克維爾 (Alexis de Tocqueville)，去同他探討切磋法國大革命歷久而不歇的原因、革命的激情和現代性的關係、民主的過去與將來……福亥與法國大革命真可謂生死相聯。

1927年，福亥生於巴黎一個左傾資產階級的家庭，良好的教育背景卻沒能使他像其他法國文化歷史名人一樣進入法國高等師範學院學習。然而，這不小的失敗卻沒有熄滅一個熱愛生活、學術的年輕人的熱情，在喪母的痛苦中，他仍然刻苦鑽研並通過法國教師資格考試。二戰末期，年少的他曾參與抵抗運動。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像許多同代的知識份子一樣，他成為共產黨員。然而，幾年後，在蘇聯紅軍的坦克鎮壓了匈亞利的起義後，他也同那時代的許多法國知識份子一樣退出了法共。幾年前，他在一個訪談中談到這段二十世紀法國知識界的重要歷史時說，在二戰後初期的法國^②：

一個年輕人是沒有其他選擇的，要麼是成為共產主義者，要麼是戴高樂

去年7月，福亥因故受傷昏迷數天之後不治而逝。他終於放棄了法國大革命的歷史探尋而自己走進歷史。也許他最急於見到的，還是他心儀已久的托克維爾，去同他探討切磋法國大革命歷久而不歇的原因、革命激情和現代性的關係、民主的過去與將來。福亥與法國大革命真可謂生死相聯。

派。法國只有這麼兩道菜，兩個設計。對我來講，戴高樂主義太右了……共產主義比戴高樂主義更吸引我，但我不是立刻加入其中，因為戰後最初幾年，法國的共產主義者是一些民族主義者或至少是假裝是。他們用盡了所有「民族」的甚至是「民族主義」的題目，——抗德、反德——讓我討厭。也許正因此，我後來常常自問為何恰恰是幾年以後，在1949，我才加入法國共產黨（而不是二戰一結束）。因為那時我們已不再是在一種民族主義的氛圍中，而是身處冷戰的時代了。

對於那些想了解法國知識界，特別是有關戰後左傾時期的法國知識份子的人來講，這是一個很好的註釋：雖然法國共產黨最強盛的時期是同民族的歷史處境相關的（這可以二戰時期為例），但對法國知識份子來講，共產主義的吸引力從根本上不同於中國知識份子之所在，恰恰是它的世界主義的意識形態、它對現代文明及現代資本主義生活方式所作的批判和它以理性方式對歷史的未來所作的宗教式承諾。而與其相反，中國知識份子的到共產主義之路，幾乎都是以民族主義為必經之途的。這是有着深層文化與歷史因由的。

在60年代法國因阿爾及利亞獨立戰爭引發的社會和政治風雲中，福亥儘管曾同許多左派知識份子一起為捍衛殖民地人民的獨立而吶喊，但他與共產主義的決裂是堅決和全面的，這不僅表現在行動上，也表現在思想和學術上。當然，這段歷史也成為他學術生活的重要養料，激盪着他對兩百年前那場巨大革命的思考，也深刻影響着他對二十世紀俄國革命的思考：他將這場大革命視為法國大革命的繼

續。1995年，他出版了一本長達五百多頁的大作《幻想的歷程——對二十世紀共產主義理念的評論》（*Le passé d'une illusion: Essai sur l'idée communiste au XX^e siècle*）^③，從歷史的角度對貫穿二十世紀人類歷史的一左一右兩種全權主義思潮和運動——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興起、衰落和崩潰進行了考察清理。此書一出，便洛陽紙貴，在短短數月內售出八萬多冊，至今不衰。西方各國專研二十世紀歷史的專家學者紛紛撰文評議，大為讚賞^④。福亥在書中指出，由於因襲上兩個世紀的革命崇拜，加上受革命激情的鼓盪、對資產階級民主的厭惡和仇恨等因素，終於在一次世界大戰毀滅性的災難的媒介下生產出共產主義以及法西斯主義這兩種意識形態和運動，尤其是共產主義以它對歷史規律性的偏執，曾驅引、幻惑了幾代人的心靈。福亥以法國歷史學家特有的優雅、洗練文筆，以及史述評論相夾相輔的方法，向我們揭明這以歷史必然性為標誌的運動實賴於許多偶然的因素才能如此一逞狂瀾。如反法西斯大潮對其發展所起的推波助瀾之功效。但隨着斯大林死亡以及那烏托邦之光的褪色黯淡，共產主義從60年代以後便開始走向其歷史的退潮期。使此書足據深度的是，福亥將此二十世紀的革命狂瀾置於他對兩三個世紀以來以法國大革命為開端的整個現代政治歷史中來考察。他援用的方法，亦是在分析法國大革命歷史中形成的，這明顯受年鑒學派以長歷史觀來看待歷史的方法影響。這裏需要說明的是，雖然他受業亦受惠於年鑒學派——是布勞代爾（Fernand Braudel）將他招進法國國家科研中心，並在1961年將他聘為由其作校長

對法國知識份子來講，共產主義的吸引力是它的世界主義的意識形態、它對現代文明及現代資本主義生活方式所作的批判和它以理性方式對歷史的未來所作的宗教式承諾。而與其相反，中國知識份子的到共產主義之路，幾乎都是以民族主義為必經之途的。這是有着深層文化與歷史因由的。

的法國高等社會科學院的教師。十六年後，他從另一位年鑿學派傳人、中世紀史專家勒高夫(Jacques Le Golf)手中接過該校校長的職位，直到八年以後卸職——但他並不認同年鑿學派的思想取向。正如人們所知，年鑿學派的思想是浸溢着決定論的歷史唯物主義的，但福亥的興趣所在，用他自己的話講：「主要感興趣是自由的歷史，感興趣那將我帶向非預期的、在過去沒有被書寫過的事物，感興趣那突然湧現、不具一個事先預定下其必然產生的原因的事物。」^⑤然而，一如論者指出，他其實還是受其一定影響的^⑥。但隨着年齡的增長和研究的深入，特別是隨着對法國大革命歷史進程的成熟認識，福亥也同歷史決定論越行越遠，終至徹底拋棄。

在法國人才輩出的歷史學界中，福亥實屬大器晚成，年近四十方才得名，幾本重要著作皆作於45-65歲之間。除中途有過短暫的從政經歷外，福亥一生以學術、以研究法國大革命為其職志。但這漫長的大革命研究歷程的起點，卻是帶有些偶然性的。儘管大學時代他就寫過有關法國大革命的畢業論文，後來卻因故中斷，直到偶然的機由又將其重新帶回這個寬闊而又激動人心的研究領域。一次，有人就一本書本法國大革命史詢問福亥的意見，福亥答之「寫得太差」，他因而受託重寫。於是，他同好友黑給(Denis Richet)合作，於1965年出版了後來引起轟動的《大革命》(La Révolution)一書。這成了他重建法國大革命歷史研究大廈的腳手架。十三年後，他出版了《思考法國大革命》(Penser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⑦，標誌着他對傳統法國大革命研究的顛覆性工作的成型(有論者甚至認為可以將

此書視為思想上後現代時代的開端標誌之一^⑧)。其後他又獨自或與人合作寫就一系列有關法國大革命的論著：《馬克思與法國大革命》(Marx et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⑨、《法國大革命——從都勾到朱來士·費伊，1770-1880》(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de Turgot à Jules Ferry, 1770-1880)^⑩、《法國大革命詞典》(La dictionnaire critiqu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⑪等，成為當代法國乃至西方世界最重要的法國大革命專家。

要理解福亥研究工作的重要性，必須將其置於二十世紀後半葉法國學術和政治的整體環境中方可明瞭，這裏無法詳述，只擇其大要介紹。首先，傳統的法國大革命史研究，多以1789年前後十數年的歷史事件為主，除了一些大家如基佐(François Guizot)、米什萊(Jules Michelet)、托克維爾外，甚少以一長歷史段的眼光來觀照這些事件。而福亥則擴展了法國大革命的概念，視其為一綿延百年、兩大往復周期的歷史過程。第一個周期為狹義上人們通常理解的法國大革命，亦即舊制度因1789年事件的爆發而崩解到拿破崙稱帝，其中經歷波旁王朝、君主立憲、雅各賓專制暴政、議會共和、波那巴主義登台；第二個周期起自1814年拿破崙帝國被歐洲眾君主的聯盟擊潰到上個世紀80年代，其中歷經波旁王朝復辟、七月王朝、第二共和、路易·波拿巴的第二帝國、第三共和的建立與成型。在這個跨度極大的歷史進程中，不僅貫穿着革命與舊制度的衝突，亦伴隨着在大革命初期便成型的一些不同思想路線之間的衝突，如人權思想與雅各賓主義、自由的理念與平等的理想、代議政府制與波拿巴主義等等的衝突。

福亥一生以學術、以研究法國大革命為其職志，但這漫長的研究歷程的起點，卻帶有些偶然性。一次，有人就一本書本法國大革命史詢問福亥的意見，福亥答之「寫得太差」，他因而受託重寫。於是，他同好友黑給合作，於1965年出版了後來引起轟動的《大革命》一書。這成了他重建法國大革命歷史研究大廈的腳手架。



福亥雖然以長時段的歷史進程來看待法國大革命，但他卻一直堅持其中之種種偶然因素所起的作用。他強調這種革命形式並不是由一種「社會矛盾」所必然決定的，也不是不可避免的。總而言之，法國大革命是由「多種系列的歷史事件交織形成的」。

對福亥來講，法國大革命之所以不同於美國獨立戰爭，是因其只有開始之確切時日而無完結之精確年期；他以十九世紀70、80年代作為法國大革命的結尾，是因為法國大革命最初的理想、人權宣言上的精神直到那時才真正得到制度上的落實。法國經歷了一世紀的流血犧牲、挫折發展，幾番探尋才形成了國家的共識。其次，福亥雖然以長時段的歷史進程來看待法國大革命，但他卻一直堅持其中種種偶然因素所起的作用：如1788年農業歉收對動員民眾的關鍵作用；路易十六末在法英貿易協定上簽字所帶來的危機等等。他強調這種革命形式並不是由一種「社會矛盾」所必然決定的，也不是不可避免的。總而言之，法國大革命是由「多種系列的歷史事件交織形成的」^⑩。

最後，福亥在其法國大革命歷史的研究中最富爭議、最具挑戰性、也恰是其貢獻最巨的，是他顛覆了法國史學界長久以來受馬克思主義史學影響而形成的、對法國大革命所謂「資產階級革命」的定論。60、70年代，法國左派在思想學術界居統治地位，使得法國大革命的研究與解釋幾乎被馬

克思主義的觀點壟斷。從1965年起，福亥就開始向這種馬克思主義的法國大革命解釋挑戰。在隨後的年代裏，他以其對法國大革命歷史的堅實研究向人們揭示用「封建主義」來談論十八世紀的法國的錯誤，指出那些被用來支持馬克思主義版本的法國大革命解說的許多史料，諸如「一個資本主義性質的資產階級」、「巨富的貴族階層」等，在那個世紀是根本不存在的。法國大革命並不是資本主義的到來。從與舊時代決裂的意義上說，的確只存在一個法國大革命；但從當時歷史參與者及其不同的要求、行為方式來講，卻存在幾個不同甚至相互矛盾衝突的法國大革命，我們不能將之視為具有相同性質的統一體。農民、市民階級和知識精英，他們對大革命的想法和計劃是大不相同的。似乎只有在對舊王朝的棄絕和對自由的渴求上，大部分的革命參與者才能找到共同點。在托克維爾對法國大革命的思想認識基礎上，福亥進一步闡明，法國大革命是一場政治的、歷史的大革命，它不是由經濟決定的。它是一次政治事件 (*événement*)，不能只用原因一結

福亥提了這樣一個問題：「在冷戰後的今天、在下一個世紀，究竟生活中還有沒有政治的位子？」在某種意義上講，二十世紀可以說是一個「政治的世紀」。然而，一旦我們脫離對政治的崇拜，難道從此就讓市場統治、決定人類的生活了嗎？在這個意義上講，我們是否需要重新挽救被政治敗壞和糟蹋了的政治？

果的直線邏輯來解釋其全部的歷史進程，因為事件發生後產生了許多由諸多因素構成的進程。法國大革命肇因也強化了一種政治激進主義的意識形態：人類的所有苦難皆可由政治的方法加以解決；且因對事物的可知性和可變化性的信念，遂產生對人類行為的可知性和道義性的信仰；革命者將他們的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對理念的捍衛混同起來，使得政治領域成了道德是非、真理對錯、敵我分明、兩軍對壘的戰場。福亥指出，庸俗馬克思主義版本的法國大革命的解釋，是布爾什維克主義和雅各賓主義的歷史單線條進步論的歷史性結合的產物；在馬克思的著作中，根本不存在對法國大革命的系統和決定論的解釋^③。

對在一個世紀裏經歷了兩次「大革命」、也深受法國大革命影響的中國知識份子來說，福亥的研究應該是有許多啟示的。如對辛亥革命的研究，筆者認為，在二十世紀中國史學上，再沒有甚麼比將辛亥革命稱為「中國的資產階級革命」更荒唐的了。對此，容將來另文專述。再有，近年來，中文世界有一十分重要的、有關二十世紀激進主義的討論。但筆者認為，如果我們只以中國的歷史經驗為參照而不將其同政治現代性的本質問題、同人類（包括中國人）在現代整體生存和思想狀態相聯繫起來思考，那麼我們是無法對此現象有更深刻的認識和了解的，也容易將此現象視為單單是中國人、中國知識份子獨有的問題。當然，這並不是說中國知識份子無需對二十世紀的中國歷史負責任，不該作更深層的反思和研究。相反，我們應該以一種全球的眼光來檢省和總結自己的過去。或許，我們只有這樣才會真正從二十世紀的中國歷史中學到了

應該學到的東西，也才有資格和能力面對下一個世紀。

談到下一個世紀，我想以福亥先生的一個問題作為本文的結束。前年初夏，巴西總統噶多索(Fernando H. Cardoso)來法訪問，筆者有幸參加了一個由法國學界、政界著名人士主持舉辦的同這位拉美著名知識份子、社會學家的學者總統的小型座談會。作為福亥先生的老朋友，噶多索滿懷敬意而又幽默地向人們講述他是怎樣拿着那本新出的《幻想的歷程》在巴西讓記者們拍照的。輪到福亥先生提問時，他略有所思地提了這樣一個言簡意賅的問題：「在冷戰後的今天、在下一個世紀，究竟生活中還有沒有政治的位子？」對具有中國文化背景的讀者來講，這並不是一個很容易理解的問題。因為，西文中的「政治」(法文的la politique或英文的politics，來自拉丁文的politicus、希臘文的πολιτικός)與作為中文翻譯的「政治」一詞，兩者無論在文化淵源和含義上，皆有着深刻的不同(需要指出的是，即使在不同的西文中，此一概念的含義也是有相對差異的)。從古希臘的城邦政治生活，到現代民主政治實踐，「政治」是作為需要公民參與的城邦或國家的公共事物，是個體道德實踐和價值實現的重要途徑之一。這與我們傳統的「政化治理」、以「政」治民的意義是很不同的(當然，現代中國人的「政治」觀亦已發生重要的變化，「政治」一辭之意也有了許多全新之意，在此不加詳論)。西方近現代的許多思想家，莫不將對政治的思考作為他們思想的重要內容，從中尋找作為社會和個人掙脫危機、走向未來的良方。二戰後，最著名者當為已故德國流亡女哲學家阿倫特(Hannah Arendt)。古希臘城邦的政治

生活，永遠是他們汲取傳統營養、靈感，並賴以批判現實或設想未來理想國的範例和源泉。當然，這其中也有走其偏頗者。法國大革命的歷史實踐、馬克思的歷史和政治哲學，都可為人們提供新的思考。在某種意義上講，二十世紀可以說是一個「政治的世紀」，然而，一旦我們脫離對政治的崇拜，難道從此就讓市場統治、決定人類的生活了嗎？在這個意義上講，我們是否需要重新挽救被政治敗壞和糟蹋了的政治，並在指出法國大革命的種種問題後，仍為大革命的許多理想而辯護呢？在福亥的研究中，他是時時不忘揭示、提醒法國大革命的歷史意義的，這也是他與強調法國大革命同在舊王朝期間便已發生的歷史趨向的種種連續性的托克維爾不同的地方。他在承認那連續性的重要的同時，還強調法國大革命的確為人類政治畫出了一個新時代。從此，真正的現代政治生活才開始了它的進程。在今天，在這樣的場合，福亥提出這樣一個問題，或許反映了他的深刻危機感。他也許有了自己的答案，也許仍在思考。總統先生到底如何回答福亥的問題，我已無印象。但這問題卻總在我心頭盤桓，因此一直想找機會去同福亥先生攀談請教，也想同他探討一下沒有被他納入《幻想的歷程》中的中國乃至其他亞非、拉美國家的革命問題。但因學業、工作、雜務纏身，未得實現。去夏學年長假之前，一次在學校門前相遇，寒暄中談到此一願望，他十分高興也欣然接收，表示待秋季新學年後找暇長談。不想從此天人永隔，我將永遠無法從他口中得知此一問題的回答了……聊作此文，一為敬悼福亥先生，二為繼續對此問題的思考，也相邀更多朋友共同

探索——探索中國和世界、今日和明天的政治的意義和形式。

註釋

① 關於François Furet的中文譯名，有譯為「傅瑞」者。其謝世的確切日期為7月12日，星期六，其家人掩而未宣，直至7月14，或含意義，以為悼念。

② “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et La Révolution dans l'Histoire: Entretien avec François Furet”, *Savoir et Mémoire*, no. 5 (1994): 3.

③ *Le passé d'une illusion: Essai sur l'idée communiste au XX^e siècle* (Paris: Robert Laffont/Calmann-Lévy, 1995).

④ 可參見*Le Debat* 1996年3-4月有關此書的專號。

⑤ 同註②，頁14。

⑥ Ran Halver, “François Furet, l'historien des passions révolutionnaires”, *Le Monde*, 16 Juillet 1997.

⑦ François Furet, *Penser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Paris: Gallimard, 1978).

⑧ David Schalk, “Intellectuals in the postmodern age”, in *Intellectuals in Politics: From the Dreyfus Affair to Salman Rushdie*, ed. Jeremy Jennings and Anthony Kemp—Welch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273.

⑨ François Furet, *Marx et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Paris: Flammarion, 1986)

⑩ François Furet,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de Turgot à Jules Ferry, 1770-1880* (Paris: Hachette, 1988).

⑪ François Furet, *La dictionnaire critiqu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Paris: Flammarion, 1988).

⑫⑬ François Furet, *Penser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48; 49, 30.

張倫 法國高等社會科學院博士候選人，現從事有關知識份子、政治哲學、現代性等問題的研究。